

沉钟译丛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德) 罗莎·卢森堡 著
殷 叙 彝
傅 惟 慈
郭 颐 顿 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LUMBERSOME TOLL

沉钟译丛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德) 罗莎·卢森堡 著

殷叙彝

傅惟慈

郭颐顿 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德)卢森堡著:殷叙彝、傅惟慈、郭
颐顿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0
(“沉钟”译丛)
ISBN 7-221-05582-3

I. 论… II. ①卢…②殷…③傅…④郭…
III. ①卢森堡-书信集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研究
IV. ①K835.167=5 ②K5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156 号

著 者	〔德〕罗莎·卢森堡
译 者	殷叙彝 傅惟慈 郭颐顿等
责任编辑	黄筑荣
装帧设计	曹琼德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9.875
印 数	6000

ISBN 7-221-05582-3/B·146

定价:21.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沉钟译丛》总序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

所谓世界走向中国，不只在自鸣钟、金鸡拿、火炮历法电报之类的使用，也不只在铁路矿山工厂银行的开设，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解构、改造、建设与完善。在此期间，西学的引进，作用不可谓不巨。所谓西学，是指西方的观念、思想、理论，以及系统的科学知识。其时，传播的渠道颇不少，如教会、学校、报刊等等，但影响最大者当推译书。朝廷人物曾国藩奏稿有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上下存此共识，“西风东渐”，自成气候。

从晚清到辛亥以至“五四”期间，翻译事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从事翻译的，由西人到中国知识分子，由个别行为到专门的译书机构；而机构，亦由官方系统及于民间组织。至于译述内容，则由应用科学、自然科学，扩大至社会科学。“西山排闼送青来”。正是翻译，带来了新的局面、新的机运。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无不因西学的沾溉而有所创造。康有为的《大同书》，有学者认为，即接受了英人所著《佐治刍言》的影响；严复的《天演论》，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更是风靡一时，面世后十年，累计达三十多种不同版本，何止乎熏陶一代人。翻译界前辈百年前起于“世变之亟”，多方开拓，筚路蓝缕，垂范至今，使我们不能不感到愧怍而且感奋；希望追随其精神，承续其事业，而有所增强。

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几经山重水复，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复重新起步。此时，有“第二次西学东渐”之说。翻译业蓬蓬勃

勃,再开一代风气,虽未见大家如严、林者,而西著出版实在不在少数。当此几个世纪缩在一时之际,译界不免趋时务实,所译多为“现代”及“后现代”著作,“前现代”则少人问津矣。殊不知,新旧后者是相对而言的。而且,思想观念其来有自,惟有穷根溯源,庶几较为全面深入把握其本质,而不失固有的完整性。何况,被称为经典者,自有其独立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故可跨越时代,历久而弥新。

《沉钟译丛》是我们策划编辑的一套开放性大型丛书,所载为上起古希腊罗马,下迄 20 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经典性文化学术著作,其中偏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译丛》拟陆续分批出版,不求大而求精;文史哲经,可容杂处,假以时日,当自成统系也。

蒙获出版界、翻译界同仁襄助,幸莫大焉。

广州日报大洋图书编译室

2000 年 10 月

出版前言

罗莎·卢森堡(1871~1919)，是波兰、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

卢森堡诞生于沙俄统治下的波兰，从青年时代起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其后，被迫流亡瑞士，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德国定居，并参与和领导了德国的工人运动。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党内的思想论战，先后创办和主编多种刊物，撰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捍卫革命和民主的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崛起的德国军国主义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几度身陷囹圄，在狱中仍然著述不辍。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卢森堡出狱后，立即投身其中，旋即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决裂，创建德国共产党。在斗争中，以意志坚决著称，敌人称之为“嗜血的罗莎”。1919年1月斗争失败，同李卜克内西一起惨遭杀害。

作为革命家的一生，卢森堡憎恨一切压迫和奴役行为，具有明确的民主思想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她所留下的大批著作，从论文到书信，对此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本书编入论文《论俄国革命》，仅此一文，即可窥见作者的政治睿见，她的革命原则所在。这篇至今仍有争议的著作，不仅是卢森堡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富于理论价值的著作之一。该文抄件于1921年以《俄国革命——批判的评价》为题首次发表。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共运

中引起激烈的争论。1928年，在柏林发现手稿原件。此后，在德、法、美等国曾多次出版过单行本，影响很大。但是，由于此文涉及到苏联模式这个敏感的问题，所以几十年来，人们避免涉及它。这种状况，一直延至70年代中期才开始改变过来。导言及附录部分，除了帮助阅读正文外，也是具有一定思想价值的文字。

此外，本书还收入卢森堡近百封书信。这些书信，不但同论文一样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而且，通过更多的关于私人生活及内心世界的亲切的诗性叙述，读者可以更全面地看到作为革命家的卢森堡的高尚、纯洁、完满的形象。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殷叙彝、傅惟慈、郭颐顿诸先生的热情支持，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

《沉钟译丛》编委会

2000年11月

目 录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

总 序

出版前言

一、论俄国革命

论俄国革命 1

一 1

二 5

三 11

四 21

附录：关于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的版本/商 鼎 36

二、书信集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22封) 45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26封) 98

致利奥·约基希斯(29封) 148

致考茨基夫妇(19封) 209

致汉斯·狄芬巴赫(14封) 244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6封) 299

论俄国革命^{〔1〕}

(1918年)

—

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的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的持久的影响,最好地驳斥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十分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俄国的革命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动摇了一切阶级关系,展示了全部社会和经济问题,它按照内在逻辑的必然性顺理成章地从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向前推进到更加深入的各个阶段——推翻沙皇制度在其中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简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说明,俄国的解放不是战争和沙皇制度军事失败的成果,并不像考茨基编辑的《新时代》在社论中所许诺的那样是“德国人手中的德国刺刀”的功劳,而是在自己的国土里有着深厚的根源,并且内部已经完全成熟了。德帝国主义

〔1〕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1922年保尔·列维第一次以小册子形式发表本文时用的书名是《俄国革命——批判的评价》。此后出版的历次德文版单行本和英文、法文译本都以《俄国革命》为书名。我们在这里采用的是民主德国1974年出版的《卢森堡全集》第4卷中的文本,篇名是全集编者加的,编者说明这是根据原稿的照相复制件排印的。——编者注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盾牌掩盖下进行的战争冒险并没有引起俄国的革命,却仅仅是起初——在 1911 ~ 1913 年间它的第一次狂风巨浪的高潮之后——使它中断了一个时期,然后,在革命爆发之后,为它制造了最困难、最不正常的条件。

但是对于每一个动脑筋的观察者来说,这一过程也是反对考茨基同政府派社会民主党共同主张的教条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据,按照这种理论,俄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农业为主的国家,对于实行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成熟的。这一理论认为俄国只适合进行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从这一观点也产生了俄国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联合的策略,而俄国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一翼,即在阿克雪里罗得和唐恩的老练领导下的所谓孟什维克的理论也是这样的。双方即俄国和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在俄国革命的这一基本观点(对策略的具体问题的态度是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上同德国的政府派社会党人是完全一致的:三者都认为俄国革命应当停留在推翻沙皇制度的阶段,而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神话,实现这一阶段就是德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崇高使命。如果俄国革命越出了这一阶段,如果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了自己的任务,那么按照这一学说,这完全是俄国工人运动激进一翼即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而革命在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发生的一切坏事,使革命遭受损失的一切混乱,无非是这一致命的错误的结果。施塔姆普费尔编辑的《前进报》和考茨基同样都把这一学说当作“马克思主义思考”的成果来推荐,它在理论上归结为这一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发现,即社会主义革命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本身的民族事务,也可以说内部事务。像考茨基这样的人当然懂得在虚无缥缈的抽象图式中十分详细地描绘资本的世界经济联系,这种联系把一切现代国家组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机体。

俄国革命是国际发展和土地问题的结果,它是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解决的。

在实践方面这一学说具有使国际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无产阶级摆脱对俄国革命的命运的责任、否认这一革命的国际关联的倾向。战争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不是证明俄国不成熟,而是证明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对俄国革命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明白无遗地揭示这一点。俄国革命的命运是完全取决于国际(事件)的。布尔什维克在确定自己的政策时完全着眼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正是他们的政治远见、他们的原则的坚定性、他们的政策的魄力的光辉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在最近十年的巨大跃进。1905~1907年的革命在欧洲仅仅引起微弱的反响。因此它始终只能停留在开始阶段。它的继续和解决是受欧洲的发展约束的。

显然,不加批判的辩解不能发掘出经验和教训的宝藏,只有详细的、深思熟虑的批判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一试验是在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一场帝国主义国际屠杀的世界战火和混乱之中,在欧洲最反动的军事强国的铁圈之中,在国际无产阶级彻底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认为在如此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中,俄国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与此相反,根据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对它的必要的历史前提的了解,人们不得不这样假定:在如此不幸的条件下,甚至依靠最伟大的理想主义和最经得起风浪的革命毅力也不能实现民主制和社会主义,而只能实现二者的软弱无力的、歪曲的开始阶段。

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义务正是要清楚地认识这一情况的全部深刻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因为只有根据这样一种痛苦的认

识才能衡量国际无产阶级为俄国革命命运承担的特殊责任的全分量。另一方面,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团结一致的国际行动发挥其起决定作用的重要意义,而这种国际行动是一个基本条件,如果缺乏它,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哪怕具有最伟大的才能和作出最崇高的牺牲,也不可避免要陷入一片混乱的矛盾和失误。

同样不容怀疑的是,领导俄国革命的聪明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荆棘丛生、陷阱遍地的道路上,仅仅是在内心十分疑惑并且思想上非常勉强的情况下采取许多决定性步骤的,他们自己决不可能认为,他们在事件纷至沓来的情况下出于万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为会被国际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的崇高范例;对这种范例只应当毫无批判地赞扬和热情地模仿。

认为对俄国革命迄今走过的道路进行批判性检验就会严重地损害俄国无产阶级的威望和富有吸引力的榜样,而只有这一榜样才能克服德国群众致命的无所作为,这种担心同样是错误的。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错误的了。德国工人阶级革命行动能力的觉醒再也不能用已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那种监护的办法,依靠对群众示意,依靠对某一毫无瑕疵的权威(无论是本国的“上级”还是“俄国的榜样”)的盲目信仰用魔法召唤出来。德国无产阶级的历史行动能力是不能凭制造欢呼革命的气氛而产生的,而是相反,只有通过了解任务的全部惊人的严肃性和全部复杂性,依靠政治成熟和思想独立性,依靠群众几十年来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以种种借口有计划地加以扼杀的批判的判断力才能产生出来。把俄国革命放在它的全部历史关系中进行批判的探讨,就是最好地训练德国和国际的工人去完成目前形势向他们提出的任务。

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从它在三月爆发到十月革命)就其一般进程来说是完全符合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图式的。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孕育的革命力量同旧社会的桎梏进行的任何一次最初的伟大总决战的典型发展过程。

革命自然而然地按上升线展开:从温和的开端发展到提出愈来愈激进的目标,与此相应,从各阶级和各党派的联合发展成最激进的党派的独占统治。

在1917年3月的最初时刻,领导革命的是“立宪党人”即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第一次全面高潮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卷进去了:第四届杜马是政变所产生的最反动的四级选举权的最反动产物,却突然转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机关。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右派民族主义者在内,突然组成了一个反对专制主义的严密阵营。专制主义在受到第一次冲击后几乎是不战而溃,就像一个已经死亡的机体一样,一碰就倒了。甚至自由资产阶级想至少挽救王朝和王位的短暂尝试也在几个小时内失败了。发展的进程迅猛异常,在几天和几小时之内就飞越了法国当时需要几十年才走完的距离。这证明,俄国已把欧洲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的成就化为现实,尤其是证明,1917年的革命是1905~1907年的革命的直接继续,而不是德国“解放者”的礼物。1917年3月的运动在十年前的运动中断工作的地方同它直接连上了。民主共和国同革命的第一次袭击一样,都是准备好了的、内部成熟的产物。

但是现在比较困难的第二项任务开始了。革命的动力从最初时刻起就是城市无产阶级群众。但他们的要求并不仅满足于

政治民主制,而是指向迫切的国际政治问题:立即实现和平。与此同时,革命还依靠同样提出立即实现和平这一要求的士兵群众和把1905年以来就已成为革命关键的土地问题提到首位的农民群众。立即实现和平和得到土地——在这两个目标上,革命阵营的内部分裂是确定无疑的了。立即实现和平的要求同以米留可夫为代言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倾向发生了非常尖锐的矛盾;土地问题起初是让资产阶级的另一翼即土地贵族害怕的妖怪,但立刻就由于侵犯了整个神圣的私有制而成为使各资产阶级恼恨的问题了。

这样就在革命最初胜利的次日,在革命队伍内部,围绕和平和土地这两个尖锐问题展开了一场内部斗争。自由资产阶级开始采用拖延和逃避的策略。工人群众、军队、农民的进攻越来越猛烈了。毫无疑问,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制的命运本身也是同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第一次风浪的冲击下也随着潮流前进直到接受了共和国政体,但很快就开始为向后退寻找支持并且悄悄组织反革命。卡列金的哥萨克部队向彼得堡的远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倾向。如果这次突击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不仅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而且民主制和共和国本身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建立军事专政以及对无产阶级实行恐怖统治,然后回到君主制,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俄国的考茨基派社会主义者即孟什维克所遵循的策略的空想性和反动本质了。

看到这个勤奋的人^{〔1〕}在世界大战的四年间通过孜孜不倦的写作活动,泰然自若和有条不紊地在社会主义上捅出一个接一个的理论破洞,简直是令人吃惊的,这一工作的结果使社会主

〔1〕指考茨基。——德文版编者注

义成了一个百孔千疮的筛子。考茨基的追随者不加批判地、平心静气地看着他们的这位官方理论家勤勤恳恳地进行这项工作,把他的日新月异的发现吞咽下去,连眉毛都不皱一下,能与之相比的只有谢德曼之流的追随者,他们同样平心静气地看着谢德曼之流在实践方面破坏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完满地互相补充的,而考茨基这位马克思主义神殿的官方守护人从战争爆发以来实际上仅仅是在理论方面完成了谢德曼们在实践方面所做的事情:第一、国际,和平的工具;第二、裁军和国际联盟,民族主义;最后第三、民主制,而不是社会主义。

他们死抱住捏造出来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说法不放,认为目前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能进行社会革命,因而拼命坚持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联合,也就是说坚持把由于革命发展自然的内在过程而陷于分裂和彼此发生极其尖锐矛盾的那些成分勉强结合在一起。阿克雪里罗得们、唐恩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同那些对革命及其第一个成就即民主制威胁最大的阶级和党派合作。

布尔什维克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作出了历史功绩,他们从一开始就宣布要实行那种惟一能挽救民主制和将革命向前推进的策略,并且坚定顽强地把这一策略贯彻到底。全部权力由工人和农民群众单独掌握,由苏维埃单独掌握——这实际上是使革命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这是用挥剑斩断戈迪安之结的办法使革命走出窄胡同,为它提供不受阻碍地进一步展开的广阔战场。

因此,列宁的党是俄国惟一在那最初时期就理解革命的真正利益的党,它是革命向前推进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它是惟一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党。

由此也可以说明这一情况: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开始时是在四面八方受到排斥、毁谤和迫害的少数派,却在很短时期以后就能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并且把全部真正的人民群众即城市无产

阶级、军队、农民以及民主派中的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的左翼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下来。

俄国革命的实际形势在几个月之后就归结为二者择一的问题：是反革命取得胜利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卡列金还是列宁。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在最初的狂热消逝之后立刻就会出现这样的客观形势，在俄国这是由关于和平和土地的具体的迫切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

在这一方面，俄国革命只不过证实了任何一次伟大革命的基本教训，革命的生存规律是：它必须非常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用铁腕克服一切障碍，日益扩大自己的目标，否则它就会很快地倒退到它的软弱无力的出发点后面，并且被反革命扼杀，在革命中是没有静止状态的，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满足于最初一度达到的目标而进行自我克制。谁想从议会的蛙鼠之战中把这种平庸的真理搬到革命策略上来，那只会证明，他对于革命的心理、革命的生存规律本身，正像对于全部历史经验一样，都是一窍不通的。

英国革命从1642年爆发以来的过程。按照客观事物的逻辑，起初长老会派软弱动摇，长老会派的首领在反对保皇派军队的犹豫不决的战争中故意逃避决战和对查理一世的胜利，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独立派必须把他们从议会赶出去并且自己夺取政权。同样，在这以后，在独立派军队内部，士兵中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里尔本的“平等派”形成了整个独立派运动的推动力。最后，士兵群众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即表现为掘地派运动的走得最远的社会革命分子，他们又是民主的“平等派”的党内的酵母。

如果没有革命无产阶级分子对士兵群众施加思想影响，没有民主派士兵群众对独立派的资产阶级上层施加压力，那么长

期议会既不会“清洗”长老会派,也不会胜利结束同保皇党和苏格兰人的战争,既不会审判和处决查理一世,也不会废除贵族院和宣布共和国。

法国大革命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这里,经过四年斗争之后,雅各宾派的夺取政权表现为惟一能挽救革命成就、实现共和制、摧毁封建主义、对内和对外组织革命防御、镇压反革命阴谋、把革命浪潮从法国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手段。

考茨基和他在俄国的思想伙伴(他们坚持俄国革命应当保持它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性质”)同上一世纪德国和英国的自由派一个模样,那些自由派把法国大革命区分为著名的两个时期:第一阶段即吉伦特派阶段的“好”革命和雅各宾政变以后的“坏”革命。自由派从自己的浅薄的历史观出发当然不需要去理解,如果“无法无天”的雅各宾派没有举行政变,那么连吉伦特派阶段最初取得的谨慎和不彻底的成就也会立刻被埋葬在革命的废墟之下;正像 1793 年的历史发展的铁的进程所表明的那样,雅各宾专政的真正代替品不是“温和的”民主制,而是波旁家族的复辟!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无法保持“中庸之道”,革命的自然规律要求迅速作出决断:要就是火车头沿着历史的上行线全速前进,直到顶点,要就是它由于本身的重力重新退回到出发时的洼地上去,并且把那些在半路上想凭自己微弱的力量使它停下的人无可挽救地一同带下深渊。

由此可以说明,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只有那个有勇气提出向前推进的口号并把它贯彻到底的党才能掌握领导并且夺得政权。由此可以说明俄国孟什维克即唐恩、策烈铁里等等所扮演的可悲的角色,他们起初对群众拥有巨大的影响,但在较长的东摇西摆之后,在竭尽全力反对接受政权和承担责任之后,他们可耻地被人们从舞台上扫除出去了。